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 编

丁守和 主编

中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
卷

丁守和 主编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编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五四
启蒙
运动
(1915~1923)

本卷选编 马 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中、下)/丁守和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

ISBN 7-80149-157-2

I. 中… II. 丁… III. 近代哲学-哲学思想-中国-文集 IV.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7503 号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中、下)



主 编: 丁守和

责任编辑: 黄燕生 杨 群 范广伟

责任校对: 同 文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54.75

字 数: 1372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ISBN 7-80149-157-2/B·027

定价(上、中、下): 10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卷前言

马 勇

一

依照学术界的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以 1919 年因山东问题而引发的爱国热潮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 1919 年前后长达十余年的新文化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的变化也相当复杂和明显。

但不论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此前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与探索的继续和发展。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清政府鉴于镇压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事的维新运动之后的停滞状况，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所带来的血的教训，深切感到统治的普遍危机，于是于 1901 年初当两宫尚在西安流亡之际便匆忙地宣布预约变法，以期以新政消弭国内人民的反抗，以变革的姿态来换取列强的重新信任。

平心而论，清政府对待这次新政的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订刑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堂、废除科举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妇女放足等等。然而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清政府的这次新政终于失败，到了 1905 年实际上已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

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颇为复杂，但从根本上说，此次新政只

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它不仅没有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兴趣，君民齐心，共度时艰，反而引起一些汉族士大夫对清政府的厌恶以及对满族人的仇视。这些士大夫普遍相信，维新志士的血迹未干，刽子手怎么可能自动变法呢？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是将满族人建立的异族政权彻底推翻，然后另起炉灶，“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①。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蔑视清政府的立宪运动，而坚持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释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坚信中国只要参照三民主义的方略便能解决所有问题，既可顺利完成政治革命，又可避免欧美诸国于政治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他说：“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则贻乎后也。”^②

很难说孙中山的设想是一种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事实上孙中山手创的中华民国也恰恰仅仅完成了政治革命，赶跑了皇帝。中华民国在其最初的年代里似乎仅有一块好听的招牌，其他方面则依然故我。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空虚与迷惘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似乎比辛亥革命之前更加混乱。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人们毕竟尚没有看到革命后的情形，总觉得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别有一番新气象。

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而苦苦思索的问题。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

① 伦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

② 《孙中山选集》，第76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

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①

鲁迅的思考反映了当时国人精神迷失的实际状况，对辛亥革命的实际后果的严重不满正是五四运动得以爆发的直接思想背景。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困惑，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批判性地对待辛亥革命发起者的精神遗产，以期通过新的思维路向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寻求一剂灵丹妙药。他们苦思寻求的结果，正如多年后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定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②。

无需否认，农民是中国社会较为落后、较为分散、较为不开化的阶级，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既然取决于农民群众的参与与否，那么又势必存在着一个如何引导农民的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亦即五四新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应当对农民进行改造，以现代观念革除农民的劣根性，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改造国民性”。他们相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既不限于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政治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使中国问题的其他方面获得连带的解决。他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期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进整个国民性的改革。

二

五四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意识、重塑国民品格的选择，是世纪初国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结果，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救自强运动的逻辑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五四的选择自然比洋务运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9。

^②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

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诸多举措深刻得多，它已触及到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认识，而且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能否具备共同的语言和素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五四的选择虽然是当时知识精英深思熟虑的结果，然其问题的焦点似乎找错了方向。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以及前此种种救亡图存运动归于失败，除去国民的不觉悟之外恐怕尚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近代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都找到过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但它们之所以统统归于失败而无法成功，并不都在于国民的不觉悟，而是另有原因存在。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危机和社会危机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然而近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都能顺利地解决这些危机，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变化与前进。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以炮舰撞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依其内在的规律似乎应该能够完成其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西方列强的入侵扰乱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仅就社会经济而言，它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与发展。

但是，西方列强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而是为了建立起它们的世界市场。因此，西方列强的到来，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了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58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

这一发展的超前和失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获得充分的发育，其先天不足无法担当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历史重任，致使近代中国一直无法真正完成新旧交替。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选择虽然极为重要，但并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

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在于，在 16、17 世纪前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虽然也遇到过一些内部障碍，但从总体上说，与欧洲文明相比并不落后，在许多领域中国仍处在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欧洲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力图吸收中国文明，改造他们的固有文化，在那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欧洲人对中国文明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心目中，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贤明政治，道德高尚，文化发达，足以作为欧洲人的楷模。

然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人方面则导致了另外一种结果，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过程中，囿于传统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确曾有过为时并不太长的自我满足。但当近代中国人冷静地反省中西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时，突然发现欧洲人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先进得多。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等实力交锋之后，学习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学习西方、赶上西方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失败，中国人始终并没有放弃过这种选择。不过，正是这种挫折与失败，引发了国人的自我怀疑情绪，觉得中国之所以不能赶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的秩序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五四的选择正是这种怀疑情绪的恶性膨胀，它使国人对中国旧的秩序与文化传统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五四新人为了启发国人的觉悟，竭力批判中国的旧道德，以为正是中国的旧道德铸就了国民的劣根性，造成了国民的蒙昧主义，使中国迟迟不得翻身和进步。因而，中国欲求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彻底废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使国民在价值取向上与现代社会相合。陈独秀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

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产生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①

陈独秀从经济关系探讨道德观念转变的必然性，自然要比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自我怀疑要深刻得多。正因为如此，五四对传统秩序的破坏也要严重得多，它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使“秩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但是，当我们冷静反省当年的情况，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五四对旧秩序的破坏具有相当的负面效应，其理论本身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伦理观念的变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当中国社会经济尚未达到陈独秀所期望的“现代”标准时，理论观念的提前转变势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不是中国旧有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换言之，包括五四在内的近代国人在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遂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

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养成人们的竞争意识，客观上或许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人们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得不在激烈的竞争中完善自身，适应环境。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有赖于能否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取决于社会内部全体成员能否携手一致，齐心协力，建立与健全一个长期持续稳定的内部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没有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独秀文存》，第82～8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6。

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除去种种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外,恐怕社会内部秩序的混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法则的相互冲突、社会公众信仰的多元化与多变性等,未始不是根本原因之一。

五四新人并不是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确曾思考过如何重建新秩序的问题。陈独秀对民主科学、法兰西文明的呼唤,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吴虞对墨家精神的仰慕,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偏爱等等,无不视为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他们一方面排斥旧秩序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渴望以新的时代精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

不过问题在于,五四对中国的社会秩序毕竟建设太少,破坏太大。一方面,五四新人精神追求的多元化使国人无所适从,使近代以来国人的信仰危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行;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①。于此不难想见国人信仰处于何等混乱的状况。

另一方面,五四新人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远远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在新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实际效用未免大大减低。如陈独秀期望国人建立“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称“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力,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②。不要说这种主张能否真正实

① 鲁迅:《我的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4~5页。

现，即或真的实现了，那又将是怎样一种状况还难想象吗？胡适赞成娜拉离家出走，然而鲁迅则反问道，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或者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某种花瓶。

三

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他们虽然生在当今世界，但其致思方式和价值取向与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并无根本区别。

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名称，但最通行的则为“儒生”、“士”或“士大夫”。他们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服务于某一利益集团或阶级，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古希腊社会中的平民阶级，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也不必为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犯愁。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许多良好的传统，他们甘于清贫，“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一般说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生命境界。但在政治上，在人格上，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有不成功便成仁的人格理想。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知识分子一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知识分子轻视专业知识，最看重的是“修齐治平”的学问，他们强调以经世致用的精神从事学术工作，总以为自己所事之学系天下之安危，社会之消长，故往往借学术攻击政治，攻击现实。这在一定范围内或许可行，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则势必导致统治者的镇压，形成新的黑暗时期，使中国社会似乎一直处在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中，而不见明显的大进步。

鉴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中国知识分子欲为国家民族效力，必须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欲讨论政治，就全力讨论政治；欲探讨学术，就冷静独立地探讨学术，一不为政治所囿，二

不与现实政治相瓜葛。果如此，其学术成果的真理成份才能增多，而社会成员各安其业，各司其职，中国焉有不进步之理？

任何社会，即使是极端黑暗的社会，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构成。它的进步与发展有赖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较早接触新事物的人，固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面对这种责任，知识分子不应当以急功近利的经世致用思想从事学术，更不应处处时时以救世主的姿态与神情面对社会公众。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与发展，取决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各司其职，协调前进。因此，就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相互关联来说，最大的教训恐怕莫过于两条，一是淡化“参与意识”，下决心以自由主义的客观立场从学术和学理上，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的综合、平衡发展打下一个坚实而长远的基础；二是化解“启蒙心态”，既不能以救世主自居，又要深切体验中国社会全体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所思所想，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案建筑在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

参与意识与启蒙心态，虽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但它在 中国历史上获得登峰造极的发展无疑是在20世纪，而其导源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逻辑发展和必然环节；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以在那个时代发生，主要的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强烈刺激而发动的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其内在的思想依据，但其智慧资源和直接动力则是外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动因主要是外国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的一败再败。瞿秋白说：“政治上：虽然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一个字到十年后才发现。西欧已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

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学术上：二十余年和欧美文化相接，科学早已编入国立学校的教科书内，却直到如今，才有人认真聘请赛先生（陈独秀先生称科学为 Mr. Science）到古旧的东方国来。”^①

很显然，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称中国启蒙运动，虽然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而激荡出来的新思潮，但其智慧资源和直接动因则是外在的，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倡导与发动的一场运动。诚如孙中山当年所揭示的那样：“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②

这“一二觉悟者”，显然是指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同事们。1915年，陈独秀有感于“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③，遂毅然独自创办《青年杂志》，欲以民主与科学唤醒国人，造就新一代自觉自立的国民，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说，“国人而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④。

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进步的两大直接动力。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社会的发生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在某种程度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而又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此，陈独秀的多元开放的文化心

①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

②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③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67页，三联书店，北京，1984。

④ 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4～9页。

态将民主与科学引进中国，足见其“先知先觉”的远见卓识。

作为文化资源的吸收与互补，民主与科学传入中国，自然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如果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同志们持之以恒地坚持十年、二十年，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和理性精神便有可能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扎下根，中国社会经济逐步发展与演变也会为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提供现实的条件和土壤。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显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①。从而，这种基于政治要求的启蒙心态不仅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夭折或变质，而且其政治氛围的加浓也势必导致本以理性精神为根本特征的启蒙运动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和不科学的成份。

推绎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的本意，他们最初的想法似乎并不愿意将启蒙运动与政治挂钩。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号召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1916年开始，以学步慢行的危心，采取哀兵的策略，作动心忍性的功夫改造自我，建立全新的人格，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②。胡适也说：解救中国的“第一要务，在于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③。而这个主意和政策，就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④。

胡适的这种主张虽然不足以代表《新青年》同仁的真实想法，但在《新青年》早期，至少是1919年之前确实是这样做的。那时的《新

①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页，东方出版社，北京，1987。

②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第33页。

③ 《胡适留学日记》卷13，1916年7月20日条。

④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第330页，黄山书社，合肥，1996。

青年》尽量避免和政治势力作直接的冲突,而以引进西方文化,促进国民性的改造为其根本任务,可惜,这种情况未能持续很久。一方面,文化的革新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这不能不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另一方面,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仁虽然暂时不愿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但在思想深处他们实在对政治有着无限的深情,一旦时机适宜,他们便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政治斗争。“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元培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民国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①。

偏激和狂热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快,但它给后世中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极其沉痛的。而这两种偏向本身似乎也不合乎他们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与民主。在现代社会,政治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原则,只是这种倾向和原则要运用得适度,要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通过民主的程序加以实现和完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号称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使不发生1919年之后的政治热情的冲击,也注定它不可能坚持十年、二十年,真正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政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四启蒙者后来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这既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又是五四启蒙运动夭折的根本原因。这一结局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热情的文化传统外,似乎还有五四启蒙者的心态以及内在理路上的原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五四启蒙者的道路选择是不破不立,他们虽然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面对西方文化,呼唤民主与科学,但在他们的骨子里却对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充满了没有丝毫缓和余地的仇恨。他们一方面批评学术上的独尊一家,好同恶异导致专制、黑暗的恶

^① 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

果，另一方面则竭力排斥和自己学术见解、政治见解不同者，企图以新的文化独裁代替旧的文化独裁。他们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旧文化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既无视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又武断而不容商量地主张彻底抛弃旧文化。1917年4月9日，胡适就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致信陈独秀说：“（文学改良）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种态度应该说是合乎现代理性精神的。而陈独秀的回答竟然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白话文学的价值是否如陈独秀所自信的那样，姑且勿论。而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本身便很难说是合乎现代理性的科学与民主。实在说来，五四启蒙者虽然在主观上追求民主与科学，期望以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但由于他们普遍怀抱有救世主的“启蒙心态”，因而在客观效果上往往可能是假借科学与民主的名义而行一种新的文化独裁之实，五四之后的中国历史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层面建立的启蒙心态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根基真正第一次发生动摇，但由于启蒙者无意识地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唯我独尊”、“真理只在我手”的思想传统，缺乏现代社会更加需要的容忍精神，因而其负面效应绝不应当低估。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五四启蒙精神，而是期望中国知识分子在淡化政治参与意识的同时，适当淡化一下启蒙心态，而以现代理性为指导，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开放心灵，既

敢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成就，也敢正视西方文化的弱点；既敢批判中国旧文化与现实生活不合的消极成份，也勇于继承、利用中国旧文化中合理的因素和要素。总之，以容忍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面向未来。

四

植根于启蒙心态的民主与科学不可能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它的假定性前提甚为明显，那就是举世皆浊我独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普渡众生，解救人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则不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不具有少数人所拥有的知识，但他们无疑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而且他们也必然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五四启蒙运动所遭遇的反击，与其说来自旧营垒中的少数知识分子，不如说来自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势力的反抗。

马克思在分析民主政治得以发生发展的社会原因时明确强调，民主政治是与商品经济相伴而来，在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小农经济处在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之中且随着后者的超经济强制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往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经济则不然。所谓商品交换纯粹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等价交换，民主政治所包含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有可能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在商品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

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显然是舶来品。虽然“民主”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得很早，然其内涵不仅没有西方近代“民主”的意味^②，而且刚好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的含义相反，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5页。

^②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7。